

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

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

萧卡题



霸

同济大学出版社

序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大专院校委员会，其中以华东师大的同志为主，着重研究刘少奇的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已出版了《刘少奇的思想概述》和《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等著作，现在又将研究的成果写出了《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书，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战略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把我国的革命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书，主要介绍了他在党的建设、白区工作、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和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为读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研究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提供一些资料，从刘少奇留下的丰富精神宝库中汲取智慧和经验，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领会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激励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胜利前进。

刘少奇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到上海、天津、东北、华北等地，从事党的白区工作。他在白区工作中，主

张尽可能地利用公开合法手段，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争取同盟者，并且注意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以保存和发展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他的这些策略思想和革命实践，是全党公认的白区工作的模范。他的这些主张，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白区工作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为实现华北、华中地区党组织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领导山西抗日新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工作。1939年后，他又组织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特别在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和陈毅等一起，迅速改变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扩大了华中地区的革命力量。

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更是我党极为宝贵的财富。1939年，他在延安马列学院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对广大党员提出了党性锻炼的要求。后来，党中央把这部论著列入重要的《整风文献》。1941年，他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又作了《论党内斗争》的讲演，批判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开展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和方法。他在华中期间，还写了多篇党建著作。这些讲演和著作，教育了全党干部和广大党员，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懂得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党建理论，教育了我党整个一代人。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首先破坏党的领导。宣扬“踢

开党委闹革命”，大搞无政府主义，党章、宪法横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在此浩劫中，刘少奇首当其冲，堂堂的国家主席，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打倒了。光辉的党建理论，成了修正主义的“黑修养”，遭到无情的批判。最早科学论述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竟然成了睡在毛主席身旁的“赫鲁晓夫”。总之，这次浩劫，党的形象遭到难以弥补的破坏。粉碎“四人帮”后，被颠倒的历史和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实行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情况发生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渗透进来，历史上封建剥削阶级的特权、专制思想和狭隘的自私自利思想，重又死灰复燃，蔓延滋长；而少数党员干部，由于自身的素质不高，放松世界观的改造，经不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搞权钱交易，因而在党内滋长着种种腐败现象。在现在的形势下，党的建设就更为重要了。没有一个好的党，要想搞好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党和政府正在大力开展反腐倡廉的工作，要求做到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要站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成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因此，今天重温刘少奇有关党建理论、政权建设的理论，特别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重要著作，用以武装广大党员的思想，看来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编写的这本书，如果对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党建工作，对正在进行反腐倡廉工作

能有所奉献，这便是对作者、编者莫大的欣慰。

郭加复

1994年5月写于上海

目 录

| | |
|------------------|--------------|
| 刘少奇对转变白区工作路线的贡献 | 张传仁(1) |
| 刘少奇对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贡献 | 常惠英 邬正洪(17) |
| 刘少奇在华中 | 陈绍畴(47) |
| 刘少奇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 丑立本 王爱玲(66) |
| 刘少奇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张大鸣 冯正钦(91) |
| 刘少奇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杰出贡献 | |
| | 唐存标 丑立本(110) |
| 刘少奇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 | |
| | 庄国蔚 商孝才(131) |
| 后记 | (152) |

刘少奇对转变白区工作路线的贡献

张传仁

1936年春，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到天津，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在此期间，他纠正了党在白区工作中“左”倾路线错误的残余，使党的白区工作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为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使党的工作全面转入抗日战争轨道作出了重大贡献。

长期以来，党的白区工作一直是“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白区的党、团和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几乎都遭到了破坏。党在白区工作的“左”倾方针政策，早已引起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不满。1935年1月，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但在长征途中，党不可能对白区工作的转变作出具体的决定。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从政治上清算了“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正如刘少奇所说：这一转变从十二月

决议发表以后，“在党内就开始了。”^①因此，从 1935 年 12 月到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是党的策略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的关键时刻——这是一个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大转变的时期。

瓦窑堡会议前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加紧蚕食华北，妄图独占全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此后，华北的学生处境十分艰难，南京国民政府加紧对学生运动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华北。这时，一部分学生产生了恐惧心理，而一些积极分子则产生了急躁情绪。由于白区工作长期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在党内“左”倾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仍严重地存在着。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外，党的组织一般没有保存下来”。^②为此，1935 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去工作。1936 年春天，刘少奇到达天津后，为了使白区工作尽快地转变到正确的方针上来，撰写了不少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如《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白区工作的党和群众工作》、《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 20 多篇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刘少奇全面阐明了党的策略转变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刘少奇既坚持了党的原则立场，又根据具体情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57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46 页

况，采取了灵活的工作方法，身体力行，为迅速地促使党的策略转变而努力。

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国民党上层将领抗日

刘少奇根据党的主张，多次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特别强调与大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可能性，并着重注意克服党内对与资产阶级联合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

1936年11月，刘少奇撰写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一文，全文分上、中、下三篇，作为党内教材。该文全面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策略转变与战略任务的关系，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代表了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思想。文章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其中心口号就是“联合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进行民族抗日战争”。文章并论述了这是一个策略上的转变，指出：以前我们是采取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而现在则是在对外战争中和各党各派等用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从一般的民主主义逐步的过渡到工农民主”。刘少奇认为，我们过去是以进行土地革命来肃清帝国主义势力，现在要转变到“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来实现肃清封建势力与土地革命的任务”。过去是依靠下层革命力量来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现在

要转变到除了依靠下层革命民众的力量外，“还尽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能的暂时的同盟者，中立一部分反革命力量，来首先打倒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汉奸。”^①

刘少奇关于策略转变具体表现在对待宋哲元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问题上。宋哲元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和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1933年率部在长城抗击日军，不久，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停止了抵抗。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宋哲元为了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宋任委员长。当时在群众抗日情绪高涨下引起了公众的不满，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刘少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详细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②并指出这些口号是错误的，主张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刘少奇提出改变对宋哲元的态度，是有充分根据的。宋哲元的副参谋长张克侠，就是中共秘密党员。在宋哲元的手下，明显地存在三种不同的势力，一种是以刘定武、张克侠为首的进步势力，他们抗日救国的主张是得到广大士兵和中、下层军官支持的；第二种势力是以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为首的

① 刘少奇，《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火线》，第67期，1936年11月20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0页

亲蒋派，他们是按照蒋介石的意志办事的；第三种势力是以天津市市长肖振瀛、张璧、陈觉生为首的亲日派。这三种势力斗争十分激烈。宋哲元在这三种势力之下，举棋不定，反复动摇。少奇同志认为：只要我们能以正确的态度影响他，是能转到抗日这方面来的。争取宋哲元抗日，对国民党中的一些爱国将领，也颇有影响。例如当时在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就表示过“只要宋哲元抗战，我一定出兵。”并且这一口号的改变，使群众的抗日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的合法的可能性。鉴于以上原因，争取宋哲元抗日，不仅有可能，并且十分必要。刘少奇针对当时对党内一些只看表面现象，缺乏对宋哲元具体分析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作了批评。

在刘少奇提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口号后的一次游行示威中，群众的游行队伍正遇着宋哲元的汽车，学生们即送上一张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的传单给宋，宋要群众到故宫后门的景山集合，并含笑而去。群众游行队伍集合到景山后，宋哲元派了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参加集会，并讲了话，当时数万群众高呼抗日口号，同唱救亡歌曲，这对降日势力是一次有力的打击。由于我党提出了正确的口号。因此，在抗战初期，对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转向抗日，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党和刘少奇对华北军队和宋哲元的争取工作，除了提出正确口号之外，还作了不少艰苦和细致的工作，主要是：（一）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二）通过群众性的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三）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

二、注意斗争策略，纠正学生运动中的错误倾向

刘少奇指出：白区工作要有一个全盘、彻底的转变，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工作任务，因为我们党十年来，在白区工作中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这种恶劣的历史传统和影响，一直没有在理论上和思想上进行清算。使党内许多同志还按照老一套的历史传统去工作，感觉不到党内有进行彻底和全盘转变的必要。为此刘少奇认为我们有必要“否定过去的错误原则，并且提出新的正确的原则去代替。”^①

刘少奇为了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于1936年4月10日发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一文，从理论上进行了全面的清算。首先，指出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重要性。刘少奇认为：“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②其次，指出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懂得积蓄我们的力量。他们违反了党的“积蓄工人群众雄厚的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③总是盲目、莽撞，使白区党的组织受损失或被破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8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页

坏，群众和同盟者都跑了。再次，指出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党的基本纲领与目前的行动口号之间的联系；完全不懂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不了解群众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最后，指出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①

当时正值“一二·九”运动之后，广大青年学生抗日热情高涨。但在青年运动中“左”倾思潮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克服，满足于一般游行示威、罢课等的公开活动，缺乏耐心细致的工作，不注意积蓄革命力量，存在着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对华北的青年学生运动，作了极为周全的考虑，做了大量工作，克服了这种错误倾向，使青年学生运动有一个彻底全盘的转变。如1936年3月，因参加爱国运动而遭到逮捕的学生郭清，在北平狱中突然死亡，引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学校当局为了此事，曾计划公开向官方交涉，要求抚恤，并以合法斗争的形式召开追悼会。但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之下，北平学联某些领导人却向学校提出抗议，并在3月31日，组织群众秘密地、突然推倒学校的墙壁，抬着空棺材，到马路上去游行，队伍经过北池子即被反动军警打散，50多人被捕，伤者无数，200多人被开除学籍。此事发生后，刘少奇立即写信给北平的同志批评了这种冒险主义的行为。并以北方局的名义，责令在北平的党员，做好善后工作，向学校当局进行解释及道歉，这才防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把我们的斗争目标集中到抗日运动方面来。

1936年5月，全国各地，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又掀起了一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热潮，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并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纲领》。在这高潮中，中共天津市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于5月中旬，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研究和布置了当前的工作，并准备组织一次由学生和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示威。5月28日，天津各界按照中共市委的原先步骤，进行了一次游行大示威。这次示威影响到其他一些大城市，5月30日上海发生了反日示威。6月13日，北平也发生了反日罢课与游行示威。反日斗争的形势对发展进步力量是十分有利的，而北平学生组织的某些领导人，在“六·一三”反日示威以后，又提出了“长期罢课”，并对反对“长期罢课”的同学，诬之为“落后分子”。刘少奇坚决纠正了这种倾向，并指出：“长期罢课”的口号是错误的，它会增加群众的厌倦之心，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并为政府镇压群众制造了借口，这是一种危险的行动。刘少奇要求党员设法说服群众，结束罢课，恢复常态，这就保持了群众之间的内部团结，迫使国民党政府放弃武装镇压，保证了我党在白区力量的积蓄。在这同时，上海、浙江等地的群众救国运动，就因为罢课时间过长，示威过多，同时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限制与镇压，造成群众情绪的某些低落和组织上的缩小。而华北地区群众性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却未见有低落的现象。

三、联合“黄色工会”，进行合法斗争

在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刘少奇是一直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倾向的。早在1930年8月，刘少奇在莫斯

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曾指出当时职工运动中的一些“左”倾错误思潮。1931年秋到1932年春夏，刘少奇在上海，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领导了白区的工人运动，这时，有人提出，“在黄色工会里建立赤色小组”、“在黄色工会里建立革命的反对派”、“打倒黄色工会”等口号，为此，刘少奇在党的《红旗周报》、《工运指南》等刊物上，发表了《建立工会辅助组织问题》、《加紧领导工人自发斗争》、《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工作》、《论罢工策略》、《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等文章，批判了在工会工作中的冒险主义，初步阐明了与黄色工会建立反帝反蒋统一战线的初步设想。

1936年4月，刘少奇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经验，又写了著名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提纲》指出：“为着要积蓄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只有这些组织和工作能够大体保存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才能从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去扩大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①长期以来，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一直不注意积蓄革命力量，要求公开暴露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即所谓赤色工会，同时，在对待黄色工会问题上，我们始终缺乏诚意，有时提出“退出黄色工会，成立赤色工会”，有时提出“转变黄色工会为赤色工会”，甚至“打倒黄色工会”、“消灭黄色工会”的口号，总是将黄色工会作为赤色工会的对立面来加以反对，使党的工作缺乏掩护，对中间力量加以排斥，刘少奇根据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了加入黄色工会，取消赤色工会的方针，从根本上转变了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刘少奇同志指出：“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①并主张取消过去那些赤色工会组织，在各级党的组织内，成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

刘少奇还提出利用国民党政府公布的工厂法、工会法等进行公开合法斗争。提出对工厂法、工会法中有利工人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太少，“我们要求马上实现。”^②甚至对国民党在工人中进行的其他活动如卫生运动、文化娱乐运动、民族扫墓运动，以至儿童节运动、植树运动、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等“我们都要利用来提出工人的要求，开展在工人群众中的斗争和工作。”^③由此可见，刘少奇在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上，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的思想。在工人群众中，刘少奇主张要努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鼓励与推动黄色工会去参加抗日救国的团体和运动，把工会工作的中心任务转变到抗日这一中心任务上来，并主张要和各抗日的工会领袖建立统一战线。《提纲》传达到上海以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一些党员，按照《提纲》精神，领导了1936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大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得到了“救国会”“七君子”和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持，并通过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与资方谈判，终于使罢工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放弃了组织赤色工会这一任务，与“劳协”等工会组织进行合作，结果，国统区的工人运动就很有起色，最后“劳协”也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会工作，与非党领导的工会组织从对立转变到合作，是同刘少奇上述策略思想的提出分不开的。

四、尊重群众、转变白区党的工作作风

长期以来，白区党的工作因受“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党的作风不够端正，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因此，刘少奇十分重视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特别是1937年5月，他在延安举行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转变作风作为白区党的建设的一项中心工作来抓。这段时期内，刘少奇阐述了有关党在群众工作方面的论述，概要如下：

1. 论述了群众工作在党的方针转变中的重要性。刘少奇多次谈到若不转变白区党的群众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领导权便不能巩固。因此提出：“目前的转变，是党与群众工作全盘的、彻底的转变。这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①

2. 指出党员要成为群众的领袖，必须切切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刘少奇认为党是群众的领袖和先锋队，“但我们在群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页